

浅析乐府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原因

——以唐代乐府诗重要作者李白为例

李婧怡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乐府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体，在历史的演变中始终没有被淘汰反而一直熠熠生辉，定有其独特的原因。笔者在此从乐府诗的风格探寻乐府诗相比于其他文体的独特性，在历史的变迁中寻找乐府诗变迁中的不可代替性，分析得出乐府诗的历史适配性体现在其来源、职能、风格和艺术成就四个方面。此外，笔者还举了乐府诗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唐朝的著名诗人李白来分析诗仙与乐府诗的适配性，证明乐府诗和李白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互相成就了对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高度。

关键词：乐府诗；历史适配性；叙事抒情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2.02.152

一、乐府诗的独特性

（一）乐府诗的风格

乐府诗作为一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歌体裁，自从两汉以来就一直散发着其独特的艺术光彩，其内容与形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后成为对中国古代诗人影响极大的一种诗体，断断续续地在历代王朝更迭中绽放出自己的光芒。乐府诗来源于乐府，即自秦开始朝廷设立的一个音乐机关，西汉时期设置乐府令负责收集编纂民间音乐进行改编整理和演奏则让乐府诗逐渐走到了我们的面前。现提乐府诗，既指当年由乐府机关收录的作品，也可以认为是魏晋后各代作者仿乐府诗体创造出来的乐府作品。

想要探寻乐府诗的风格，需结合着时代背景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入手。乐府诗在形式方面可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语言朴实自然，多用排偶句，且内容回环往复，韵律自由多变、朗朗上口。如汉乐府广为人知的作品《陌上桑》中的那句“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正是如此。而这也是古代诗歌《诗经》中的重要特色之一，由此看来，乐府诗的出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在历史中对前期诗歌文学继承发展，逐渐演变为自身风格。二是乐府诗的形式既有常用的杂言、五言诗等，也不乏三言、四言、六言等，经过秦代以来的百家争鸣中历史散文的发展，诗歌的文体也随之得到丰富，这丰富的形式毫无疑问对于表达具有复杂性的思想内容是大有裨益的。三是汉乐府中着重通过人物的语言以及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如《陌上桑》中罗敷的回答“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则是通过对话来展现出罗敷本身机敏的性格和随机应变

的处事方式。采取对话或者独白作为诗歌内容的抒发方式，既是刻画生动的人物形象的绝佳办法，同时也是乐府诗由民间采集而来所具备的一大特色——生动朴素的口语是当时民众文化水平的体现。

而乐府诗在内容方面则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是汉乐府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色——叙事性，其内容皆为“缘事而发”。从早期的《诗经·国风》中的《氓》和《谷风》等即可看出，叙事性是我们离不开的重要课题之一，汉乐府也顺着这条路继续发展，和前朝一脉相承，而后期的诗歌发展历程中我们也会发现，在笔法和体裁二者此起彼伏地兴旺衰退时，叙事抒情一如既往地作为评判作品高下的标准从未动摇。其次，由于汉乐府诗歌是来自民间歌谣，所以语言自然在朴素直白的同时还能够体现人民的主观情感，也就意味着乐府诗兼具叙事和抒情两个功能，这也是它能够屹立于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而不至于短期衰退的原因。古往今来，叙事和抒情的结合正是我们对于文学的要求，例如在宋代大放异彩的“词”，之所以由简单的歌曲变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环，就因为它在满足叙事的要求之同时，还可以担起时下文学家抒情言志说理的重任，这也再次证明了叙事为本、抒情为根是诗歌成就的重要评判标准。回到汉乐府本身，正是其叙事与抒情的完美结合，且语言又通俗易懂，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感情真挚动人。除此之外，尽管是叙事为主，但汉乐府并不局限于现实主义精准刻画，在一些作品中也吸取了楚辞等文学的特点，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来表达创作者的想法。

（二）乐府诗的变迁

魏晋时期的乐府机关仍在，但史料中并未发现当时

的乐府机关去民间收集诗歌的记载，而他们使用的诗歌也皆为汉乐府时期的歌辞。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再次收集民歌，然而南朝和北朝乐府诗却有了明显的区分。南朝乐府诗偏向于描写男女之情，语句中也注重用双关表现情感；相比于南朝乐府诗的细腻，北朝乐府诗风则更加雄浑广阔，内容也更加丰富，其中既有展现边塞风光、抒发尚武精神的，也有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到了建安时期，文人已经开始仿古，即用乐府旧题重新写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上抒发个人胸臆，这一类的乐府诗实际上已经与音乐无关而演变成独立的文体。这也是乐府诗的一个重大转变。此后隋唐时，乐府诗再次迎来自己的兴盛，这一时代也出现了很多创作乐府诗的名家，如李白、杜甫等人。中唐时白居易、元稹作为“新乐府运动”的领头人，继续主张不按旧谱、旧题，只取“缘事而发”的叙事精神来创作。这一时期，以白居易为首，诗人创造新题乐府，将乐府诗带到了全新的境界。而后的宋元明清，乐府诗也不断发展，各代文学家对乐府诗进行详尽的分类，甚至于明代出现以诗人对乐府诗进行分类的观点。乐府诗就这样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着、前进着，在时代的洪流中一点点站稳了脚跟。

究其根本，乐府诗之所以能一路屹立不倒，其根源是因为乐府诗与历史发展的适配性。乐府诗来源于民间，它可以反映出民众的生活情况和风土人情，同时也能表现出百姓好恶、反映广阔且深刻的社会现实，有利于统治者了解民情。如《陌上桑》，不仅描写了机智灵敏的罗敷，也刻画出了一个仗势欺人的官僚贵族的形象，这类诗在反映地方民情的基础上还多出了一个类似于监督官吏的职能，尽管这并不是其出现的本意，但仍能为统治者和时下官员提供一定参考价值。我们现在常说以民为本，要求注重人民生活，因为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乐府诗在反映人民生活、抒发人民情感上做出了极大的成就，因而与历史发展具有极高的适配性。这一点在史料记载中也有迹可循，东汉班固在撰写《汉书》时这样解释乐府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里的“观风俗，知薄厚”即是化用以前“采风观政”的意思，认为乐府诗在宫廷内的演奏也可以方便上层督查官员。乐府诗本身对于叙事性的偏重也使得其真实地反映了历史，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再加上乐府机关是由朝廷设置，本身具有权威性，对于乐府诗的保留也更

加精细，不至于使其流失在动荡的年代而失传。

除此之外，乐府诗由于多数出自社会下层人民之口，语言通俗易懂，利于流传，就像新乐府运动的领头人白居易的创作就属于“老妪能懂”。而且乐府诗并不拘泥于音律与格式，而是更加注重叙事与抒情达意，这种没有墨守成规的创作对于有创作欲望的诗人来说提高了他们的上限——雕琢词句的功夫花费得少，在内容创作方面投入的精力就会更大，诗歌也更容易达到一个高度。如唐代“诗仙”李白，其豪放飘逸的笔法与奇妙瑰丽的想象最合适的体裁也就是乐府诗这种毫不拘束的创作方式，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跨越千年仍广泛流传并被后世予以极高评价便是乐府诗丝毫不限制诗人的个人发挥的最好证明。而乐府精神之所以能够波及后世、影响深远，是因为它对于诗歌向更高的层次上发展起了桥梁的作用。首先，乐府诗是货真价实的民间文学出身，尽管由乐府收集演唱，但仍可以从其叙事角度、语言风格等方面窥见它朴实无华的风格。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大众熟悉的“下里巴人”，却也兼具上流文学的抒情和推敲，甚至在后来的发展中被文人开发出各种功能，还有了风格迥异的类别。正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乐府诗即是来源于百姓的生活，却也有高于生活的能力，它更像是一座连接文人与人间烟火气的一座桥梁，它是通俗的文学，也是大众的艺术。这种本身具有的多元包容性也使得乐府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李白与乐府诗

（一）李白选择乐府诗的原因

郁贤皓在《李白选集序》中说：“李白诗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他的乐府诗，其现存乐府诗一百四十九首。……他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扩大题材，改换主题，恰恰相反，他是在继承前人创作总体性格的基础上，沿着原来的主题、形象、气氛、韵律向前发展，即在同一方向上把这题目写深、写透、写彻底，发挥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境地，从而使后来的人难以为继。”李白能在乐府诗上有如此高的造诣，是他与乐府诗完美适配的例证。从先秦到盛唐，诗歌体裁有了极大发展，格律诗也开始展露锋芒，然而李白确是少有的能将乐府诗拿捏得恰到好处的诗人，与其说他适合乐府诗，不如说是他选择了乐府诗。

李白放荡不羁的性格和乐府诗不拘一格的创作十分搭配，不循规蹈矩又充满真性情是二者共同的特点，由

此看来李白对于乐府诗的推崇似乎是根深蒂固刻在性格之中的。他的复古思想从他自己的作品《古风（其一）》中已经展露得十分明显，他认为像《诗经》那样直抒胸臆才是应被推崇的，而建安以后的那些偏向于繁缛的词句、绮丽浮华的篇章是应该被否定的。这看似只是受到初唐时期陈子昂诗文革新运动提到的“汉魏风骨，风雅兴寄”的影响，摒弃齐梁颓靡诗风对诗人的禁锢，实则与整个盛唐时期的时代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初唐时期唐朝就已经显现出了自己的繁荣和活力，一如当年汉代大一统时的盛景，于是进一步巩固政权就成了君主的必须完成的使命。在这样的要求下，以唐太宗为首的政治家们便主张用诗歌反对绮艳文风，强调诗歌的政教功用。由此，儒学这颗蒙尘的明珠再次焕发生机，随着儒学的又一次兴起，文学复古的风潮也再一次呈现，李白的复古思想正在这时逐渐培养出来。此时，写作不拘细节、风格复古的乐府诗正是怀揣政治理想从外入中原的李白选择的最佳途径。早期乐府诗的社会影响力并不大，因为乐府诗起初是用于祭祀和皇家娱乐而采集演唱的，而在乐府诗高度兴盛的那段时期，拟写乐府诗之人多为上流社会的名士与贵族，乐府诗的题材和格式都并不宽泛，带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然而在复古思潮再次来临的唐朝，李白既崇尚《诗经》中比兴的手法，又想要在仕途上赢得自己的声望，加之李白本身出众的才华，借瑰丽的想象创造古体诗来抒情言志就变成里他在求仕阶段必须经历的一个课题。李白雄浑奇特的诗风也与开放包容多元的盛唐气象分离不开，何况李白家中从商，条件富裕，自幼并非在中原长大，因而见多识广的机会更多，也有实力可以保存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还有难能可贵的少年意气。研读李白的诗歌，浪漫主义的作品占了大多数，也有不少作品致力于描写仙宫、神话等场景，表面看上去一是李白个人奇特的想象力的产物，二是寄托于玄学的证明，而这似乎和积极乐观的盛唐气象并不相符。但细究就会发现，这些作品中不乏楚辞的影子，战国时期屈原靠描写美人与神话等来寄托自己对故国政治前途的美好愿景与个人的高尚情操，在将近一千年后的唐朝，李白也是如此，靠着瑰丽的想象将自己一展宏图的愿望、对国家未来的期许与渴望受到君主赏识一并融入他那放荡不羁的、极具个人特色的乐府诗中。众所周知，古乐府诗多为现实主义表达，和李白所擅长的浪漫主义可谓是大相径庭，但李白却将自己的风格与乐府诗的形式融合得恰到好处。这也

是时代和人共同造就的结果，唐朝吸取前朝教训，势必要在以前的基础上进行革新，而作为君主巩固统治的诗歌自然也不可能一味仿古，而应有属于自己的创新。李白本人性格狂放，天性不受约束，甚至被杜甫认为有着“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胆识，自然也不可能委屈在古体诗的要求之下，于是李白创作于开元十二年的《峨眉山月歌》的平仄就不符合七绝的要求，所以李白在命名时加入“歌”字，显然是作乐府新题处理，也是我们能追踪的较早的新题乐府诗。

（二）李白的乐府诗成就

李白的乐府诗既继承了前人的精华，又为后续乐府诗的新发展开创了道路，打下了完备的基础。他打破了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固定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完成了乐府诗从汉魏时期到唐代的转变，为新题乐府的发展做了铺垫。他从传统汉魏的乐府诗中汲取了多种元素，且所拟用的古题均在古乐府的谱系之中，同时他又可以做到因事赋题，因情赋题，借用比兴和讽喻的手法，不把乐府诗当成作诗的要求而是抒发个人情志的工具，使乐府诗在文人中的地位由元曲之流娱情文体变得更加具有文学性，对文人更有吸引力，也由此绵延了乐府诗的生命力。正是有因为大量广为后世流传精妙的古体诗在他的作品中散发着独特的光彩，李白的诗歌成就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难以超越的，因而被称为“诗仙”。

结语

乐府诗的发展变化并非偶然，也不只是靠某些个人文学家就能屹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并占据一块重要地位，而是它本身的特质和一定的时代风格相适配，也就是说乐府诗在古代王朝的更迭中是必然占据一席之地的。李白作为新旧乐府交替之中的传承人，在乐府诗的长河中划出了一道分水岭，他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之上进行巧夺天工的个人创作，才有了李白乐府诗的瑰奇景象和巅峰地位。

参考文献

- [1] [汉]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
- [2] 陈红. 浅谈乐府诗的发展演变及分类[J].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0(3): 25-26.
- [3] 郁贤皓. 论李白乐府的特质[J]. 李白学刊, 1989.

作者简介: 李婧怡(2002年03月), 女, 汉族, 辽宁省锦州市,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在读, 研究方向: 戏剧影视文学。